

李约瑟与联合国教科文的上海往事

■ 谢喆平

1946年结束英国驻华教育参赞任期后,李约瑟(Joseph Needham)应老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赫胥黎(Sir Julian Sorell Huxley)之邀,赴巴黎出任该组织自然科学部门的首任负责人。由于美国甚为不满赫胥黎这个英国生物学家的左翼政治倾向,他的总干事任期被刻意缩短为两年,李约瑟与之进退,于1948年离任,返回母校剑桥大学。由于时局只有两年,他这段在国际组织的工作世人所知不多。实际上,他在短暂的任期内,不但促成了将“科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业务领域(原只包括教育和文化),也推动了在中国设立东方科学馆,在中东、远东、拉美等地增设教科文组织科学馆,推动了国际间的科学合作和援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方科学馆设立的时间为1947年,1953年因国际形势变化而宣布停止运营,1956年完全关闭。东方科学馆的办公地点先设在南京,后移至上海黄浦——二战后共有十个联合国机构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业务分支。1948年1月,国民政府将黄浦路106号的大厦拨给联合国系统使用,将该大厦定名为“联合国大厦”,即今之黄浦饭店。除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之外,9个联合国在沪机构均先后搬入办公。东方科学馆于1948年2月1日在上海中山北路671号开设,委派阿根廷天文学家Felix Cernuschi博士担任主任(因故未到任),实际运作中由捷克人施茂德(Jan Smid)担任主任,旨在“使特别需要科学情报与协助的区域能迅速获得资料与协助”。该馆存续期间,为中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家的研究机构、高校和学者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协助,如赠送科研器材和书籍、搜集科学家著作、编辑科学家人名录,并协助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金的科学家出国进行交流深造。获得帮助的包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协和等一大批中国高校。

东方科学馆的一批重要档案存放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图书馆,是其第35、36、37卷,主要是与总部的往来文件。三卷档案中除大量工作汇报与沟通文件外,以第35卷收入的李约瑟与中方高层间的数封信函尤为珍贵。这批信函的往来时间均在1947年秋,包括李约瑟致萨本栋、杭立武、俞大维、王世杰、翁文灏及朱家骅信。中方回复李约瑟的信则包括刘师舜代王世杰的回复、朱家骅和翁文灏的回复。

这是一批从未公开过的往来信件,主要任务是介绍将开设的东方科学馆并为之寻求可能的帮助,行文体现了李约瑟细致的工作风格,也间接说明了他来华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和中美科学合作馆馆长期间与中国学者及学者出身的政府高层的交往。尽管学科背景不同,但李约瑟与翁文灏和俞大维的交往尤深,原因应当是战争因素,比如“如中国空军研

究研制的用于飞机制造和修理上的竹制层板,被应用在盟国内部;中国资源委员会制造的全套无线电天线都在其他盟国军队中使用”。

兹将部分往来信函摘录翻译如下:

1. 李约瑟致萨本栋(1947.8.5)

我亲爱的萨本栋:

想必您知道,1946年11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李书华博士等中国代表与会)决定在世界各地开设一批科学馆。我随信附上几份相关文件,以说明该计划。我们期望这些科学馆开展我1942—1946年在华工作的中英合作馆类似的工作。

我们建议远东的科学合作馆设在南京。Felix Cernuschi博士,一位非常能干的阿根廷天文学家,将作为首席科学馆员。他的助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工程师施茂德博士。当然,他们都会带着合适的介绍信。我们预计Cernuschi博士无论如何都会在9月中旬到达南京。

在Cernuschi博士找到办公场所之前,您是否可以在中央研究院提供桌子或房间,让他在南京开始工作。也许Cernuschi夫人会陪她丈夫一起去。如果您能为他们找到最初几周的住处,我将不胜感激。我们将在Cernuschi博士确认抵达日期后发您电报。如果您能介绍一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做Cernuschi博士的临时秘书,我们将非常感谢。如果秘书既会说法语又会说英语,那就更理想了,但是这可能很困难。

目前,鲁桂珍博士在这里为Cernuschi博士提供许多建议,这对我们很有价值。因此,他不会完全不了解他所期待的事情。我现在同时给杭立武写信,内容大致相同。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您真诚的

李约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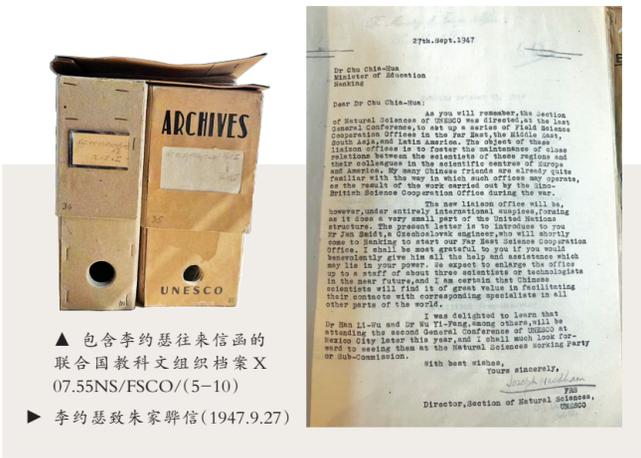
2. 李约瑟致王世杰(1947.8.5)

尊敬的王世杰博士:

1946年11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定在中美洲、南亚和拉丁美洲设立一系列实地科学馆,目的是促进这些地区的科学家与欧洲和北美等科学中心的同事保持密切联系。许多中国朋友已经相当熟悉这种办公室的运作方式,因为我曾在战时有幸指导过中英科学馆。但是新的科学馆将完全由国际社会主持,尽管很小,但它是联合国的组成部分。

我此信是为了向您介绍施茂德先生,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工程师,他不久将到南京开始运营远东科学合作办公室。如果您能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我将非常感激。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该办公室扩充为大约三名科学人员。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会发现它在促进他们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专家的联系方面有很大价值。

我相信您一定正在为当前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处境而焦虑。我曾犹豫是否应以此信相扰,但是我想,您可能愿意知



▲ 包含李约瑟往来信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X 07.55NS/FSC0/(5-10)

▶ 李约瑟致朱家骅信(1947.9.27)

道,世上总有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像珊瑚虫一样,尽管天空黑暗,但仍坚持致力于日复一日的民间兄弟般的合作。

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您真诚的

李约瑟

3. 李约瑟致翁文灏(1947.8.5)

主体内容与致王世杰信基本一致,不赘。唯在信末告知“我刚刚休了非常需要的假期,完成了《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一书的校对”。

4. 李约瑟致俞大维(1947.9.27)

主体内容也与致王世杰信基本一致。信末也告知新书的校样修订,并特别强调“其中收入了许多我战时在中英科学馆完成的工作。在校书过程中我经常想起您和兵工署,当年我在华时极为钦佩你们的工作”。

5. 朱家骅复信李约瑟(1947.10.25)

亲爱的李博士:

非常感谢您9月27日的来信。我经常听闻您在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以及海外工作的成功,但是我们在中非常想念您。至于我们,在巴黎协助您的王博士将会告知您教育部、中研院和我本人的近况。

我非常高兴得知你们决定在中国开设科学馆并为此委派施茂德先生。我们将提供给他最好的合作与协助。中研院物理所刚建成了一栋新楼。我们已开会决定施茂德先生可以先临时在该楼办公,并入住所主任的住宅。

至于墨西哥大会(教科文组织第三届大会),由于外汇面临大问题,我们这次没有像前两届大会那样派人参加。杭立武先生此次率团与会,但吴贻芳博士由于校务在身而不能出国。本人不能与会感到抱歉,我此前已经两次未能与会。职责使我无法成行,但我希望不久之后能在中国见到您。

最好的祝愿

您诚挚的

朱家骅

6. 翁文灏复信李约瑟(1947.11.22)

亲爱的李教授:

我已收到您9月27日的来信。因为

论衡

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另一半

■ 梁捷

2023年10月9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颁发给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教授,表彰她“推动了我们对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戈尔丁也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前两位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迪弗洛(Esther Duflo),分别在2009年和2019年获得诺奖。不过戈尔丁是首位单独获得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可见她的工作之重要。

戈尔丁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最终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她曾于2013至2014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并当选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戈尔丁的研究涉及劳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对历史和当下同等关注,且擅长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探讨当下问题的根源。戈尔丁著作极多,其中《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2021)已有中译,另一经典著作与卡茨(Lawrence F. Katz)合作的《教

育和技术的赛跑》,近期也已重译出版。

劳动力市场的女性问题

戈尔丁最出名的一些研究都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问题有关。比如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Effect of ‘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中,巧妙地利用自然实验方法来检验交响乐团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揭示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现象。

过去,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在招聘时是从申请者中筛选一些优秀的音乐家直接面试。乐团便总是更倾向于录用男性音乐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交响乐团在招聘过程中开始采用“盲演”形式,即只通过屏幕向评委展示演奏者的音乐,中间隔一块幕布,隐瞒演奏者身份。评委既然无法了解演奏者性别,只能根据演奏者的技艺水平来评价。

戈尔丁对招聘方式改革前后的花名册和试听唱片进行了测算。她发现,“盲演”使得女性音乐家进入下一轮选拔的可能性增加50%,进入终选环节的可能性也增加数倍。所以1970年代以后,交响乐团新雇佣音乐家中的女性比例显著提高,“盲演”正是其中相当重要

的原因。“盲演”形式有助于女性音乐家进入交响乐团。其他行业如果采用类似的面试手段,也会显著减少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通过率。

戈尔丁的另一项著名研究是2002年发表的“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主题与避孕药有关。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都在18至21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处于大学阶段。戈尔丁对比了1970和1980年代的女性调查数据,发现在1970年,大学新生中只有10%的女性,而这些女性中又有一半会在23岁前结婚,即刚毕业就结婚,退出劳动力市场。到了1980年,新生中女性比例已经提高到35%,在23岁前结婚的比例则下降到不足30%,也就是大多数女性毕业后不会急着结婚,而是进入工作状态。

戈尔丁认为,这种变化与避孕药的可获得性快速提升有关。1970年代后,避孕药迅速普及,由此极大地降低了女性意外怀孕的可能性,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女性不再担心意外怀孕,从而就敢于读大学,敢于找工作,敢于为自己的长期发展而投入人力资本。最终结果是受教育女性比例显著提高,也有更多女大学生在毕业后进入劳动

力市场,全面促进了女性就业。后来《经济学人》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要超过相对论和核反应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革。

女性劳动参与率

戈尔丁也是个历史学家,一直关注长时段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她曾研究近七十年美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发现在这些年里,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7倍。而不同世代的女性对于工作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代已婚同时就业的女性,一般都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强认同感,不同于以前世代的女性。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构成一个U型曲线。一百多年前,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很高,但这不是什么好事。直到现在,世界上一些特别贫困的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很高。因为基础设施差,生产力也低下,女性必须下地干活,一同维持全家的生计。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女性开始回归家庭,变成家庭主妇。拥有很高比例家庭主妇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不算太糟糕。随着女性回归家庭,女性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但受过教育的女性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会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

1940年代可能是美国女性重返职场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时期,人手紧缺,很多女性离开家庭,投入工作。二战结束后,女性纷纷回归家庭,但仍有一些在继续工作。据1950年代的统计数据,当时正在工作的已婚女性中,有一半早在1940年代就已工作。二战经历启发了很多女性,使她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工作,这对后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具

有重大影响。不过到了今天,戈尔丁也承认,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能不再是一个有效反映女性就业问题的指标。因为今天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形式有了变化。今天的高薪岗位普遍有这样的特点: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同时还要求雇员长时间待命,随时应对突来的要求。戈尔丁把这种工作性质称作“贪婪工作”。贪婪工作必定要挤占家庭时间,很多女性为了保护家庭,选择放弃贪婪工作。

技术与教育的赛跑

除性别研究外,戈尔丁也逐渐把研究转向贫富差距拉大等更广阔、更一般化的劳动经济命题。她发现,在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差距都在缩小。可自197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差距重新开始拉大。到了本世纪之初,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回到1900年代的水平。美国收入不平等水平在过去一个世纪也构成了U型。

戈尔丁尝试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她发现技术变革与教育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最终可能决定了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差距的走势。一方面,技术进步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提升他们的工资溢价。如电脑发明以后,就需要一批擅长使用电脑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会明显高于不懂电脑的劳动者。电脑发展速度越快,工资溢价也就越高。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供给侧,教育会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假如这个社会需要大量精通电脑的劳动者,很多大学都会想方设法开设电脑类专业,相关的业务培训也会遍地开花。大家都为了高工资而努力学习教育,工

资溢价不断降低,最终趋近于零。到了那时候,大家发现学了电脑也并不比学其他专业好找工作,工资溢价就消失了。所以,技术进步与教育进步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比较、不停赛跑的关系。技术进步得快,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就提高得快;而教育快速进步,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就会被拉下来。两者之间谁能相对领先,谁就能决定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教育跑得更快。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受教育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长,使得美国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期美国的技术虽有进步,但进步速度比不上教育增长。这就使得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不断提高,而收入不平等差距不断减小,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但是这种局面在上世纪末发生了逆转。美国的科技在上世纪末取得了巨大突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技术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与此同时,美国教育进步速度开始放缓。教育已经普及,再要提高变得很难,教育进步逐渐开始落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这样一来,收入不平等差距又开始拉大,一点一点退步到上世纪初的水平。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感知到戈尔丁的研究风格。她有很深的历史功底,擅长从长时间、大范围的视角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同时她又极为细腻,可以捕捉到劳动力市场变动中的深层机制。她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行为变动的认识。毕竟只有理解女性,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一半,才有可能理解全体。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化身千百,隐于具体而微的对象。小人物与小地方在思想史上虽是背景音一般的存在,近看之下,却是一花一世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表示,本次研讨会四位主题演讲者聚焦的地方和人物,正是具体的历史研究的一种示范。

《文汇报》节选部分内容,展现他们的视角和关切。

袍哥有精神的起源,有组织的起源。但他们自述的这些历史在清代的官方档案中都没有呈现。那么,除了他们自己的叙述,还有什么根据吗?我觉得在这里,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概念非常有帮助。他说今天想象中的传统,有的并非来自过去,或者这个过去其实并不久远,而是后来人发明的。像今天纪念馆的茶馆,有竹椅、有木桌,是20世纪初才有的;火锅,是1980年代才创造出来的。然而外地人到成都都说,哦这是成都的传统。我们读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新的传统可能被轻而重,重而轻。我们读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新的传统可能被轻而重,重而轻。我们读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新的传统可能被轻而重,重而轻。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18世纪活跃于珠江口的小人物黄东,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位船长当事(仆人)。后来,东方语言学家Sir William Jones在翻译《诗经》时也找过他帮忙,但黄东忙着做生意,拒绝了。如果答应,他就差点成为翻译《诗经》的第一个中国人。

这让我想到各种叫“阿X”的事,都是比较下层的人物,在思想交流方面其实发挥了非常前沿的作用。我们还不忘记他们稍“上”的人物,如冒险教授外国人中文的助教和教书先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造就思想的流动。其实,中外交流史有很多顺手拈来的情景,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我希望我们可以联通几个世界,这可能是中外的世界,可能是上下的世界,可能是思想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世界,也可能是文字和口述的世界。

——程家宝(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

正德嘉靖年间,莆田在京做官的人老不得志,就回老家,一待几十年,做家乡建设。这些人对正统文化、国家制度研究得很透,拿回来实践、改造,最后变成地方文化。

不同的家族、村落通过里社形成一种联盟,基本标志就是他们每年要把各自在庙里的代表抬出来巡游。这就是今天莆田系企业诞生的基本原理——五湖四海的人都要回家参加仪式,热闹几天后开始喝酒谈生

「联通几个世界」

■ 本报记者 李纯一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广东的“鱼生”、新马的“捞起”、日本的“刺身”,这些词如何成为分歧的概念,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头脑里,对之又有怎样的雅俗区分、卫生甄别?

关于生与熟的问题,我是从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中获得灵感的。不过他说的“得采取一种特定文化的观点”,其中既有研究对象的文化,又有研究者自己的特定文化。两者交错之下,要做学术化处理就要使用概念工具。本来食客很自然的行为,被我们形成了一大堆对立的观念。如何在澄清的同时,维护当事人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